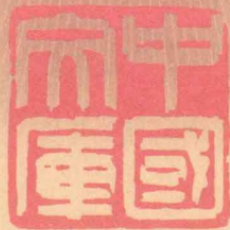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李学勤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史学类

#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李学勤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李学勤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5617-7155-6

I. 中… II. 李…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178 号

责任编辑: 陈丽菲 许 静

特约编辑: 洪 煜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王铁生 单浩生

##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Zhongguo Gudai Wenming Yanjiu

李学勤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ecnupress.com.cn>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625

字数: 504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978-7-5617-7155-6

定价: 39.00 元

##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6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

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三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0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四辑作为“新中国60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新中国成立60年来祖国大陆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 代前言：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共有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想谈一下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题目想谈一下作为探寻中华文明第一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成果；第三个题目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探寻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

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有一句名言：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属于自然史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属于人类史的研究，而人类史和自然史是连续的，是整个的宇宙一直到人类的发展过程。现在我们看起来，从宇宙的发展一直到人类的发展，有一系列起源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科学上大家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问题。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之后，就是地球和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以及银河系的起源问题。在这个之后，还有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问题。在生命的起源问题之后，还有人类的起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人类的起源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说是和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一样，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从来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文明起源问题？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人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么样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之下，摆脱了自然的动物

状态,怎么从自然的动物状态,或者我们叫做野蛮的状态,进入了人类的文明社会。这样的问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马克思到恩格斯都非常关注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曾经参考了当时有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说俄国的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美国的亨利·摩尔根的著作等。大家知道亨利·摩尔根的名著就是《古代社会》,很早就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对此研究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参考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做过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有一部名著,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面,恩格斯专门讨论了从野蛮到文明的问题,而且从这个问题引导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后来列宁在他的《论国家》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恩格斯在他这部经典著作里面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他主要举了三方面的例子,第一个是古代的希腊,第二个是古代的罗马,第三个是古代的日耳曼。他根据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历史的研究,对比了当时一些人类学的研究,然后讨论了怎么样来看待从野蛮到文明这样一个重大变革的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

当时的欧洲,东方学和考古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很少提到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的,比如像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像古代的印度。他们完全没有提到古代中国,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到今天这个情况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只要谈到世界的古代历史,都是讲到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刚才说的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古代的印度,还有古代的中国。

我们中国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幅员最大，当时人口也最众多的一个。而且中国不但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还有一点是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以及与希腊、罗马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绝地传流下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古代埃及固然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可是古代的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非常遥远，今天的埃及与古代的埃及，不管是在人种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那几个古国，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等，这些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断绝了。就是希腊、罗马这样的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后来到中世纪也中断了，所以后来才有文艺复兴，它们的文明都没有一直从古代传流到现在。只有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虽然中国的历史有这么多的风云变幻，有这么多的朝代更替，可是中国的文明是一直传流下来，一直传流到今天，这个应该说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正如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就是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今天的中国人口占到世界上的五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在古代世界里面，中国也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相对众多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我们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把我国中国文明的起源忽略掉，那么，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应该说有所欠缺的，是不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人类的起源问题。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有助于有关文明起源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的探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正如各位所了解的，中国人，包括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都是以中国文明的历史悠久、它的绵延不绝、它的光辉灿烂



而自豪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以及华侨、华裔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去科学地探究、说明、阐述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过程，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刚才我们谈到中国人都以中国的文明的历史悠久而自豪，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上人人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用另一句话来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因为我们说是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的文明从炎帝、黄帝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炎帝、黄帝那个时代距离今天，一般的理解就是将近五千年。所以我们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和炎黄子孙这句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呢？这是有根据的，有着古书上明确的依据。

我们中国的历史书，过去按传统的说法，有正史、别史、杂史、小史，有各种各样的史书。中国的史书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所以外国有学者说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历史的民族。中国传统叫做正史的，主要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大家都知道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在《史记》里面关于黄帝的记载当然和世界上其他古代国家和民族的古史一样，带有很多的神话色彩，古代史书一定是这样的，可是里面也有很多今天看起来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记录。根据《史记》的记载，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文明的创造，所以现在每年祭黄帝陵，里面有一个匾，上面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这句话，就是说根据我们历史上的传说记载，黄帝时期是我们文明的开始，或者是发皇的时代。而黄帝的的时间，按中国史书上的传说来说就是五千年前左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那时推翻清朝的统治，不再用清朝皇帝的纪年了，就曾经用过黄帝的纪元。当时有不同的看法，有几种数字，一般都在四千六百多年或者四千七百多年，所以说黄帝距今五千年左右，这个是有史书依据的。当然有史书的依据并不能得到现在学术界的公认，

因为史书的记载有一些是神话传说，有一些是经过后人的窜改，不一定都那么可靠。

那么我们中国的文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就不能只依靠历史上的文献记载，而要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中国现代的学者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中国文明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通过怎么样的途径起源的？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非常注意。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专门写出著作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说在1929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被推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部专著，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就提出来，说恩格斯所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可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中国。郭沫若同志写这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要以恩格斯的著作作为向导，把恩格斯所没有讲到的中国补充进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郭沫若同志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很多学者又在这方面做了探讨。

近二十几年来，随着我们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考古工作发展得特别迅速，有了一系列的、有些甚至是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我们今天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我们早期的历史，已经有了过去所不具备的材料积累，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学科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在我们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有关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有责任进行研究而且要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件事，在今年（2002年）的4月11日曾经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发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题目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在这个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同志有一个开幕词，标题叫做《研究历史，指点未来》。他说研究和借鉴历

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科学界、知识界的责任,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宋健同志说,现在世界上有人不喜欢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这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清朝龚自珍讲过“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取其史”。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的一个著名学者,他提到要想把一个国家彻底毁灭,一定要去掉它的历史,这一点后来梁启超也多有发挥。所以宋健同志引他的话,说我们和后人都应该小心,不要上当。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探索我们文明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过程,这样对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会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今天我向大家讲的第一点,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

6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它的主要成果。刚才我们谈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它的起源和它的发展,新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国家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这方面起步,做了一些工作,用新的方法,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去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样的工作我们在几年以前已经开始做了,这就是作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1996年启动的大型科研项目。在它开始设立时,论证的文件里面就规定了,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要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工程的目的是确定的,就是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做一个准备,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工程可以视为系统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起步。

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想在这里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多学科交叉,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三个朝

代的年代学问题。大家知道夏、商、周是中国古代三个重要的朝代,当然它的距今时间比刚才说的五千年的黄帝时代要晚些,可是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繁荣、最发达的时代。研究它的年代学问题,就是要对这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和历史的研究给出一个时间上的尺度,就是说这些朝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给一个科学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1995年秋天开始提出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宋健同志,他邀请了在北京的一批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的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提出来,有没有可能利用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具有的一定的条件和优势,来支持一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当时各方面的学者汇报了有关学科所进行的情况和条件,最后宋健同志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先进行年代学方面的研究,首先弄清楚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设立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1995年的年末,由当时在国务院负责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宋健同志,还有另一位国务委员,就是负责社会科学和文物考古方面的,今天在座的李铁映同志,共同组织召集了一个比较大的会议。这个会议有7个部委级的单位领导,包括当时的国家科委,今天的科技部,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国家教委,现在的教育部,还有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7个单位的领导参加这个会议,邀请有关学科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建立。这个项目被列为“九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到1996年春天,经过反复研究和准备,组成了由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提出可行性论证报告,最后在1996年5月16日正式宣布启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大型的按照系统工程的原则组织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一共设立了9个课题,本来设立了36个专题,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又滚动增加了一批,最后一共是9个课

题 44 个专题。参加的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一共有约 200 人参加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之下,经过了 5 年的集体努力,9 个课题 44 个专题陆续结题,达到了预期的目标。2000 年 9 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组的验收。同年 10 月,由工程的专家组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 年到 2000 年的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夏商周断代工程”,它的内容就是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的年代。周实际指西周,东周的年代是清楚的,所以主要是夏代、商代和西周的年代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过程之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也不是现代提出来的,而是在古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确切年代,或者说年表,只能追溯到公元前 9 世纪的中叶。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从今年往上推,每一年都可以讲出中国以及国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整个的历史都可以一年一年排出来。从今年来说,今年是 2002 年,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入了世界杯,昨天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回到了北京,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去年在国际上发生了“9·11”事件,前年又有什么,一年一年都可以在历史上往上推。我们中国的历史,按这样往上推,可以推到什么时候?可以推到公元前 841 年,公元前 841 年以前就不行了。为什么这样?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候的人,他在当时编著的《史记》里面已经做了年表,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一年一年排出来。他的最早的年表叫《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是选取了周以及一些重要的诸侯国,排成一个年表,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创造。他的年表不是从东周开始的,而是从西周晚期,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开始。大家知道在西周晚期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周厉王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对民众的剥削特别厉

害,实行暴政,依靠着一批坏人,大肆聚敛,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国人起义”,把他赶走了,把周厉王从当时他的首都,就是现在西安附近长安县,一直赶到山西去了。他被流放在那里,一直到死。这个时候周朝就没有王了,由两个大臣来执政,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由周召二公来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共和”这个词后来就被借用来翻译 republic 这个词,共和国的共和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一事件是有准确的纪年的,按公元来说,就是公元前 841 年。

司马迁为什么不往前编这个年表了呢?在他的书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他不是没有看到有关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而是看到很多种。他说他看到很多的书,这些书里面从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可是互相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觉得既然是不同的,他不能够选定哪一种说法,因此他就存而不论,就不编成年表。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司马迁所看到的材料,很多是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的,他是西汉时候的人,很多他看到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态度还是非常之好的。

有些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说中国人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只能确切地上溯到公元前 841 年,这在世界上是不是很落后的?并不是这样,其实各个古代国家基本都是一样的,它越早的历史就越模糊,这是必然的现象。比如说古代埃及的历史,如果确切一年一年往上推,按照历史书的记载,也只能推到公元前 7—8 世纪。希腊的历史也差不多。中国推到公元前 841 年,就是公元前 9 世纪的中叶,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是这究竟不能满足研究历史的要求。因此在司马迁死后就有学者要来补充,来解决司马迁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早做这个工作的是著名学者刘歆。刘歆是西汉末年的人,他不但是文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当时非常有成就的天文历算专家。刘歆是我们现在所知在司马迁之后第一个用当时新的方法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学者,他研究的结果都记录在《汉

书》里。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就是周朝开始的这一年,是公元前1122年。他的学说是有很广泛的影响的。可是不管是刘歆,还是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其他学者所做的许许多多的工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什么原因呢?我想各位都可以了解,因为所有这些学者他们所用的材料都是古书,一般说起来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只有失传,很难有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要超过司马迁,要得到一个公认的结果,就很难了,所以只凭古书来研究就不能够超过司马迁的记载。当然他们弄清了一些问题,这里就不详细来说了。

从清代晚期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由于有了较多的青铜器的铭文,即金文的发现,情况有了不同,特别是1899年发现了殷墟的甲骨文,提供了古书里面所没有的新材料。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使人们对古代有了新的认识途径,根据这些材料,又有很多的学者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年代学问题,取得了许许多多的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很多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进步。可是他们的工作仍然不能得到学者的公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了解,对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即使像年代学研究这样很具体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任何一个学者专家,即使他在自己学科方面是最权威的、最前沿的,他仍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这些有关学科都能够占领、都能够掌握,这做不到。过去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年代学这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般说起来,他们都是基本以自己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最多也是和他接近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进行交流参考,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研究。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留下来,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得到新的进步。

我们在筹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就特别体会到我们当

前条件的特殊性,不但是近二十多年以来,考古新发现积累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量的新材料,而且我们有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可以比较顺利地来组织多学科、大型的系统工程。这样我们就组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涉及的学科超过10个,主要有4个门类,一个是历史学,包括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一个是考古学,还有古文字学,就是对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古代文字的考释研究。一个是天文学,包括古代历法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科技测年,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主要的是碳14年代测定,是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测定方法。这样就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各位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究竟是采取怎么样的途径来研究?9个课题,44个专题,各自有具体的研究途径,如果一一介绍呢,那太繁琐,不太实际。请允许我用不很恰当的方法做一个比喻,使大家了解到我们基本上采取怎么样的途径。大家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的项目就像一个车间一样,有两条生产流水线,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古代的年代。大家知道我们要求的是用数字来表示年代,就是说得出的成果不管精确到什么程度,是要用公元前多少年来表示出来。我们说生产线可以生产出这些数字。有怎么样的两条生产线呢?

第一条生产线是关于文字记录。文字记录又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古书里面有关年代的记载。中国的古书传世的特别多,里面有很丰富的记载,当然有不少我们现在可以采用的记录。对于这些文献记录,我们进行普遍搜集,建立了电脑资料库,从里面选择出有意义的一些材料来。对于每一个有意义的材料都要进行历史学、文献学的审查、验证,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可信性的研究。要研究这条材料是不是可信,能不能使用,如果能使用的话,能使用到什么程度,对这方面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在这样研究以后,这个材料才可以使用。文字记录还有一类,不是在古书里面,就是刚才



介绍的出土的材料,比如说青铜器上有青铜器的铭文,殷墟和其他地方的甲骨上面有甲骨文,诸如此类的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首先要进行考古学的鉴定,这些材料属于考古学上的什么文化、什么时期等等,要弄清楚。在弄清楚这些问题条件之下,对于上面的文字进行研究考释。换句话说,经过这些过程,搜集了古文字和古书里面有关的,特别是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材料,把材料交给天文学家进行研究和计算。大家知道古代很多天文材料可以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进行推算,达到很准确的程度,比如说像日食、月食这类推算都非常准确,还有历法的材料也可进行排比推算。经过天文历法推算之后,就得出一系列数字。这条生产线就是这样,经过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天文学等研究,得出一系列数字。

还有一条生产线,是没有文字的,是对一些典型的考古遗址进行研究。为什么叫典型考古遗址呢?“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而这三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它的都城所在的若干地点我们是知道的。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考古遗址,有些遗址很可能就是史书里面的夏、商、周王朝和它们诸侯国的都城。大家知道都城的遗址是最有代表性的,就像现在我们就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化,很多方面要看我们首都北京的文化,道理一样。所以选择已经做过考古工作的一系列的典型遗址,对于这些遗址要首先进行考古学分期的研究。有些考古学家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了,“工程”对这些工作进行核对和补充,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发掘。实际上我们在“工程”过程中也有不少很重要的发现,就不详细汇报了。对于这些遗址经过了考古学的分期,然后要取一些系列的测年标本,不是一个标本,而是取一系列的标本,进行系统的碳14测定。我们用的碳14测定方法是两种,一种是常规的测定方法;对于一些有必要的标本,则用加速器质谱计的方法,对小量的标本来进行测定。不管是用常规的碳14测定方法,还是用加速器的测定方法,其结果都可以得出的一系列数字。这